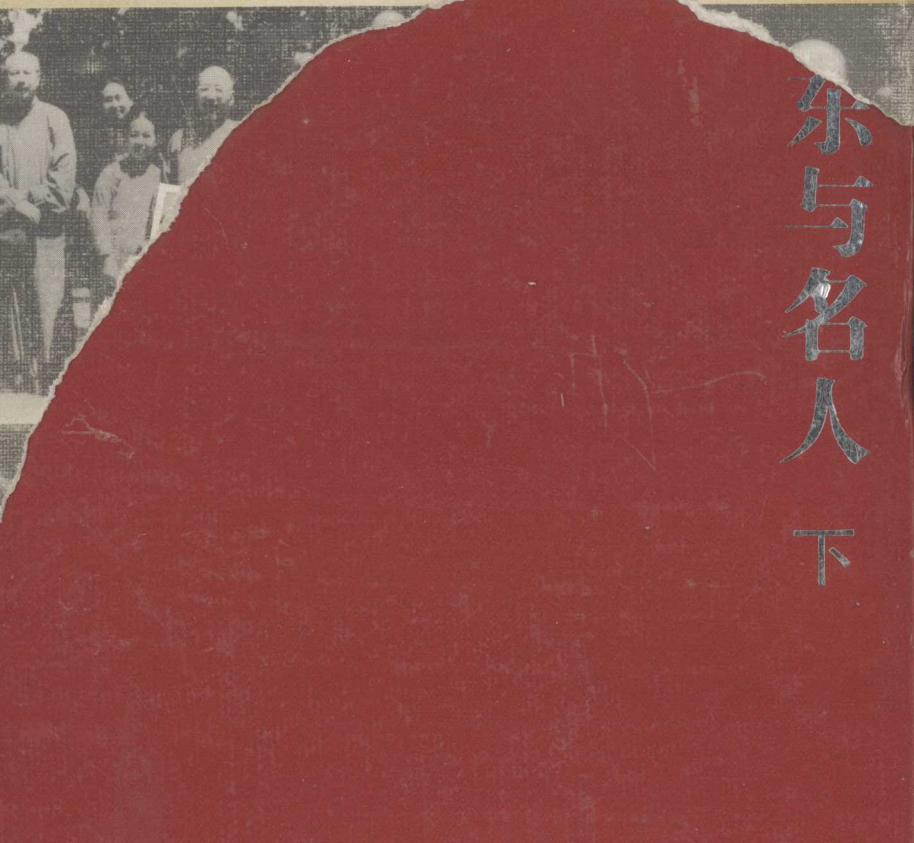


毛泽东 与 名人

江苏人民出版社
孙琴安 李师贞 著

东与名人
下



毛泽东与名人

孙琴安 李师贞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ZL030414

A75
S 4

020013

363570



Z1030414

(苏)新登字第 001 号

书 名 毛泽东与名人

编 著 者 孙琴安等

责任编辑 周环 孙立 杨健
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邮政编码: 210009)

地址: 南京中央路 165 号

印 刷 者 淮海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38.5 插页 6

印 数 1—5000 册

字 数 820 千字

版 次 199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—214—01027—5/G·254

定 价 29.80 元(全两册、精装)

(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毛泽东与胡风

胡风于1902年生于湖北蕪春，早年曾参加“左联”，深得鲁迅赏识。他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诗人和文学批评家，曾著有诗集《野花与箭》、《为祖国而歌》、《欢乐颂》、《安魂曲》、《光荣赞》等，散文集《人环二记》、《从源头到洪流》等，文艺评论集《文艺笔谈》、《为了明天》、《论现实主义的路》、《逆流的日子》等。

1938年，在武汉失守之前，胡风正在汉口主编《七月》杂志。每期出来，他都通过丁玲分送给延安的有关同志。以后，丁玲又把这项工作交给刘雪苇。

同年5月，《七月》第三集第一期出版了，胡风又给刘雪苇寄来了一些，并关照他分送给毛泽东一册。

刘雪苇收到杂志后，立刻给毛泽东送了一册，并附了一封信，信上说：

汉口《七月》半月刊主编胡风先生寄来第三集第一期《七月》，嘱分赠一本给你，现特转上，祈查收。专此

并致最高敬礼！

毛泽东收到胡风寄来的《七月》杂志，翻了一下，发现目录中有《座谈会记录》一文，便阅览了起来。他一口气读完，感到很满意，就当即给刘雪苇回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

收到了，谢谢！我已看了《座谈会记录》，很高兴。如有新的，请续寄给我。五月二十八日。

武汉失守以后，胡风来到重庆，继续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。

1939年，正在重庆工作的胡风忽然接到丁玲的一封信，其中并夹有毛泽东抄给她的那首《临江仙》的词。原来丁玲在延安工作很忙，有时上前线，她怕在这战乱动荡的年代里，如把毛泽东赠送给她的词丢失了太可惜。为了保存这一手迹，她把它寄给了远在重庆的胡风。因为在当时一般人的目光中，毕竟重庆是相对安定的大后方。

“啊！这是毛泽东的字！”胡风一下惊呼起来，他马上认出了这是毛泽东的亲笔字。

胡风深知此字的珍贵，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。于是，他就把毛泽东亲笔抄录的这首词放在牛皮纸信封里。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查抄，他特意在信封上加写上含蓄双关的“毛笔”二字。然后又把信封装进用来珍藏自己稿件的皮箱里，始终带在身边。

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发生后，国民党政府加紧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，胡风出走香港，临行前，他又把丁玲寄给他的毛泽东字幅夹在日记本里，又用钢笔在上面写上“丁存”二字，把它留在重庆郊区的一个亲戚的家里，这才放心地离去。

“珍珠港”事件以后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1941年，香港沦陷。胡风又重新回到重庆，特意来到亲戚家，再把毛泽东的亲笔词取回来，继续珍藏在身边。

这时，胡风已成了一位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。他在重庆创办“南天出版社”的同时，并创刊《希望》杂志，出版了《论民族

形式问题》、《在混乱里面》等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。这对于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来说，胡风的名字未必是全然陌生的。

1945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，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胜利。在当时全国人民的争民主、要团结的声浪之中，蒋介石为中外国际政治局势所迫，向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发出了邀请，要他来重庆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。

毛泽东与他的伙伴们通过中外政治形势的周密分析，毅然于8月28日飞抵重庆。

那时胡风正在重庆，听到毛泽东来山城，很想见一见他。9月4日晚，胡风和冯雪峰同到曾家岩50号，碰到徐冰。徐冰说：“我陪你们到红岩山上去，毛主席晚上在那里，可以见见面。”

可是，当3人到那里时，碰巧正在举行舞会。毛泽东正被人邀着跳舞。徐冰好不容易才找了个机会，将胡风和冯雪峰引到毛泽东的面前。冯雪峰与毛泽东是早就认识的了，所以徐冰特地把胡风介绍给毛泽东。

“这是胡风先生。”徐冰热情地说。

“噢。”毛泽东一听，忙伸出手来，很客气地跟胡风握手。

两人刚谈了几句话，忽然，一名从延安来的女记者走过来，拉着毛泽东撒娇地说：“我就是不让你们说话。”说罢，就把毛泽东拉走了。过不一会，毛泽东又有机会与胡风站在一起，并对胡风说：“你过去的刊物我是看的，但近来没有时间看。”没说上几句话，毛泽东又被人拉去跳舞了。过了几天，毛泽东将返回延安，张治中办了盛大酒会进行欢送，胡风也被邀请参加了酒会，又得以与毛泽东见面，因当时人多，未及谈话。十月十一日早晨，胡风与郭沫若、茅盾等各界人士去九龙坡机场为

毛泽东送行。毛泽东正要上飞机，徐冰忽然把胡风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，示意他上去与毛泽东握手。胡风犹豫了一下，竟没好意思走上去握手。毛泽东与周恩来握别后，飞机就起飞了。一九四九年九月，胡风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同年十月，他参加了开国大典。

由于胡风提倡作家应具有“主观的战斗精神”，不少共产党作家认为这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相背离的。1951年11月，全国文联常委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“自我教育、自我改造”的号召，决定在文艺界进行整风。在整风中，有些读者给《文艺报》来信，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展批判，《〈文艺报〉通讯员内部通报》刊登了这些来信。

胡风看了这些刊登的信件，心中不满，且又不安。1952年4月，周扬来上海与胡风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，胡风的不满与不安又增加了。当时的上海市委文化局副局长彭柏山觉得这样下去不好，就提议胡风给毛泽东与周恩来报告请示。

胡风考虑了两天，不安感终于使他在5月4日给毛泽东与周恩来写了信，并附上了《〈文艺报〉通讯员内部通报》所发表的那几封要求公开批评他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。

不久，阳翰笙把胡风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转给周扬，周扬看后，又转给周恩来，同时又附上自己的一封信，谈了自己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帮助胡风检讨的看法和意见。7月27日，周恩来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，同意周扬的意见。并在同日给胡风的一封回信中说：“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转去。”

但毛泽东没有给胡风回信。

9月6日起，中宣部在部分作家内连续召开4次座谈会，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批评。然后将情况写成报告呈周恩来。

周恩来在报告中作了批示。随后这一批示和报告又经毛泽东和刘少奇圈阅。

1954年7月，胡风等写了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》(又称《三十万言书》)，呈交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，由他转交中共中央，希望毛泽东能知道这些情况。

同年冬，文联、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，周扬在会议结束时发言，他的发言即是那篇《我们必须战斗》的文章。据说这篇文章事先是呈毛泽东看过的，并且他在12月8日发言前，先在毛泽东那儿听指示，然后才来大会作发言，其中有一部分内容都是针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而进行批判的。

这次会议以后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认为胡风的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》中关于文艺思想和组织领导部分，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，应在文艺界和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，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，并将胡风报告中的部分材料公开印发。作协主席团的意见转到了毛泽东手中，毛泽东阅毕，在文字上又作了些修改，然后批示道：

刘、周、邓即阅，退陆定一同志，照办。

毛泽东

一月十二日

不久，胡风得知《文艺报》要刊登他的意见书并组织公开讨论后，知道这种所谓的“公开讨论”实际上就是公开批判，于是就在1955年1月14日晚去找周扬，表示承认错误，并希望最好不要发表他的意见书，即使发表，在卷首附上他写的一篇《我的声明》。《声明》说：

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，我受到了

很大教育,现在正在检查这个“材料”里面的错误,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人时,我首先声明两点:

一、这个“材料”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,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,有害的。

二、这个“材料”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。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,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,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,但现在“材料”已印好,来不及修正。

以上一切,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,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。

周扬第二天立即写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份报告,就胡风要同登《我的声明》一事进行请示,并请转呈毛泽东。周扬在报告中说:昨晚胡风来谈话,表示承认错误,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,思想方法片面,并有个人英雄主义,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,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,如要发表,也希望作些修改,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。毛泽东看了周扬的报告,在上面批示道:

刘、周、小平阅,退周扬同志:

(一)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;(二)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、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,不要让他逃到“小资产阶级观点”里躲藏起来。

毛泽东

一月十五日

同年4月,林默涵看到了一批胡风写给舒芜的信,与周扬

商量下来，决定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，并请当时的主编康濯加一个编者按语。康濯写后，周扬忽然想到，舒芜提供的材料比较重要，发表前似应给毛泽东看一下较妥，于是就在5月9日把舒芜提供的信件材料和康濯的编者按语，以及胡风写的《我的自我批判》一文，一同呈交毛泽东，其中并附有周扬自己写的一封信。

5月11日，毛泽东在看了周扬送来的材料和文章后，感到康濯的按语写得不好，就亲笔另写了一个按语，并在周扬的信上批示道：

周扬同志：

按语不好，改写了一个，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？如以为可用，请另抄付印，原稿退还给我为盼！

可登《人民日报》，然后在《文艺报》转载。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。

如不同意，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，或明日下午，来我处一商。

舒芜提供的一些胡风写给他的信，题目原定为《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》，后被毛泽东改为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》。毛泽东写的按语，即5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编者按语，其中说：

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，二月作了修改，三月又写了“附记”的“我的自我批判”，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”一同发表，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，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。从舒芜文章所揭露

的材料，读者可以看出，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、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。……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，而不是骗人的检讨。剥去假面，揭露真相，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，从此做个真正的人，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。

毛泽东的编者按语发表仅3天，胡风就锒铛入狱。然后对胡风的批判斗争愈演愈烈。

5月24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公布了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》。这批材料开头、中间和结尾的编者按语，都是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，有的甚至就是毛泽东亲自加的。

6月6日，毛泽东收到了有关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和由邓拓起草的《人民日报》社论后，又批示道：

定一、周扬同志：

社论尚未看。对“第三批材料”的注文修改了一点，增加了几段。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几位别的同志，如陈伯达、胡乔木、邓拓、林默涵等，共同商量一下，看是否妥当。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，做一点文章进去。

请再打清样送我看一次。

清样打出来后（最好今天下午打出），除送你们要送的人以外，请送刘、周、小平、彭真、彭德怀、董必武、张闻天、康生各一份（朱、林、陈云同志不在家），并请他们提出意见，又及。

6月8日，毛泽东改好由邓拓起草的社论，题目是《必须

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》。他又批示道：

定一、周扬、邓拓同志：

社论和“材料”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，请你们酌定。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同志看。关于写文章，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，反而减损了力量。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（也是逻辑问题）。废话应当尽量除去。

请定一务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胡风分子简历送交我为盼！

毛泽东

六月八日上午八时

这篇社论经毛泽东删改后，几乎只剩下一个题目了。6月10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这篇社论和有关胡风的第三批材料。其中将原先的“胡风反党集团”，一律改称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。这次的编者按语全是毛泽东亲自加的，只有张中晓给胡风的一封涉及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信后的按语，是由周扬和林默涵共同起草的。

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》公布后，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声讨胡风的浪潮，各种批判文章和漫画铺天盖地。中共中央即决定将关于胡风材料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。毛泽东特地为此小册子写了序言。6月12日，他批示道：

定一、周扬、邓拓同志：

写了一个序言，两条按语，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，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，加以修改，然后付印。

6月16日凌晨，毛泽东又下批示：

尚昆同志转交定一、周扬、邓拓同志：

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，请你们再看一遍，如无错误，即可付印，并打纸版供各地照印。

此书出版的时候，可将《序言》一篇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（题目叫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”的序言），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他的，不要登报。

不久，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，此书便在全国出版发行了。

胡风受到关押和批判的第二年——1956年4月25日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《论十大关系》的讲话，在《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》一节中曾提到胡风，他说：

什么样的人不杀呢？胡风、潘汉年、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，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、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。不杀他们，不是没有可杀之罪，而是杀了不利。

1957年1月，毛泽东《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》中又说：

第四点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，我看还是对的，是合乎辩证法的。

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，毛泽东自信对胡风的批判和斗争完全是正确和必要的。他的《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〉的序言》和一部分按语，曾被收进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中，而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第五册中，则收进了毛泽东批判胡风的全部按语。

胡风被批判和关押以后，毛泽东曾多次催促公安部长罗瑞卿：“胡风一案应迅速判决，不能老是这样关着。”

可是，胡风一案直到1965年才作出判决：胡风被判有期徒刑14年，监外执行。这样，直到1965年底，胡风才从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中被放了出来。总共被关了十年时间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一年不到，胡风就被两名持枪的解放军押到劳改农场，随后又被押送成都看守所。

胡风在关押期间无事，便默吟诗词，有时就写在报纸的空白处，等待释放的那一天。

1969年5月，胡风自知从1955年5月至今，14年刑期已满，提出释放要求。可是当局非但不释放他，反把他在报纸上记下的诗词污蔑成“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”，被判无期徒刑，戴着手铐关进四川大竹县第三监狱，不准他上诉，也不让他看判决书。

胡风至此完全绝望，精神上受到极度创伤，并开始混乱。毛泽东去世后，胡风才以77岁的高龄，走出牢房，他的冤案也才得以平反。不幸的是，胡风才过了6年身患重病的自由民生活，便与世长辞了。

毛泽东与柯仲平

自延安成为“红都”以后，这里的群众文艺和群众诗歌运动也曾搞得非常红火。这种热闹气氛的形成，柯仲平出力不小。

柯仲平原名柯维翰，生于1902年，云南广南县人。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7年，在抗战的硝烟之中，他来到了延安，在文协担任工作。

1938年4月，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文艺晚会，特意邀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前来观看。当时，延安职工业余剧团演出的是历史传统剧，一个是平剧《升官图》，另一个是秦腔《五典坡》。看的人很多，真有点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的样子。

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种情景，他看了一阵，就侧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边区工会主席齐华说：“看来这种戏很受群众欢迎，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，就是内容太旧了，能改成新内容就好了。”

齐华点点头，然后对毛泽东说：“文协老柯在这里，他是专家。”

这时毛泽东又转过身来，问坐在后面的柯仲平：“是不是应该？”

柯仲平点点头。他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却暗暗拿定主意：

一定要组织一个剧团，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形式，表现新的革命内容。

要表现新的革命内容，就一定要有新的剧本；要有新的剧本，就一定要有新的编剧。他就想到了在延安师范学校教书的马健翎。此人不但能吹、能拉，还能编、能导。当柯仲平找到他，向他说了毛泽东看戏时的谈话后，马健翎思想上很有顾虑，怕搞不好。但经不起柯仲平“三顾茅庐”，只得答应了。

于是，在柯仲平的动员下，马健翎就带着延安师范业余剧团，去与延安工人业余剧团合并，1938年7月4日正式成立边区民众剧团，柯仲平任团长。

在柯仲平与马健翎的密切合作下，民众剧团渐渐在边区产生了影响。但剧团的经费来源却没有保障，连吃饭也是靠文协机关同志节余下来的粮食，生活很艰苦。

不知怎么传出去的，毛泽东知道了柯仲平他们的困难，他就把自己写《论持久战》的稿费捐献给了民众剧团。

这使柯仲平大受鼓舞，他把毛泽东的捐款一部分用来购买幕布、汽灯、道具等必需品，剩下的就装在布“围肚”里，每当剧团碰到困难，演员有情绪时，他就拿出钱袋，给大家打气说：“你们看，毛主席支持我们，这是毛主席的钱啊！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。”

1938年夏季的一个傍晚，边区印刷厂的工人开晚会。毛泽东也从凤凰山麓赶来参加了。在晚会上，柯仲平当场朗诵了自己的新作——《边区自卫军》。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，柯仲平用洪亮的云南口音，读得热情奔放，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。

读了一半，柯仲平见下面还很长，怕影响毛泽东的时间，

便停了下来，问毛泽东：“还要不要念下去？”毛泽东把手一挥：“念下去。”于是，柯仲平又兴致勃勃地往下念起来。

读完以后，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，高兴地说：“你把工农大众作了诗的主人，对民歌形式进行了吸收、融化，为诗歌的大众化作出了辛勤的努力。”

更有趣的是，毛泽东还特意把诗稿带了回去。仅过了一两天，毛泽东就派警卫员把诗稿还给了柯仲平，上面还批了几句赞扬的话，说是“此稿甚好，赶快发表”。

不久，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《解放》杂志就发表了这首诗。柯仲平特意在诗前加了个小序，说：“这诗写成后，曾得一位同志崇高的鼓励。我除深致感谢外，以后必然要更加努力的。”这里所说的“一位同志”，显然就是指的毛泽东。

1942年5月，柯仲平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，并代表民众剧团在大会上作了发言。在进行大会讨论时，柯仲平针对有些人看不起《小放牛》的情绪，说：“你们瞧不起《小放牛》吗？老百姓都很欢迎。我们每次演出之后，群众都拿出许多鸡蛋来慰劳我们。我们一边吃着鸡蛋，一边向新的演出地点走去，鸡蛋皮就扔了一路。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，那不用问，只要顺着鸡蛋皮走就找到了。”

听到这儿，参加讨论的毛泽东不禁笑起来了，说：“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，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，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，不要骄傲自满。你们如果老是《小放牛》，就没有鸡蛋吃了。”

这年9月的一天，天气晴朗，由于延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，依然感到盛夏般的酷热。舒群和柯仲平应毛泽东之约，一起到毛泽东的住地枣园去谈话。